

高考的社会功能

郑若玲

摘要: 高考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本的教育考试制度,并已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的“举国大考”,具有教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更新社会结构等多项社会功能。尽管现行高考制度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及现实的挑战,但高考的平民色彩、高考对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以及民众对它的高度认可,是无论多么激烈的批判都无法否定的。对高考社会功能之分析,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 高考; 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 G424.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10(2007)03-0031-04

高考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本教育考试制度,自1952年建制至今,已有55年历史。虽然“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但1977年恢复迄今,高考不仅规模逐年扩大,而且制度建设在改革中不断得到发展,在为高校选拔大量合格新生的同时,也为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和促进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高考已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的“举国大考”。伴随高考快速发展的,也有愈来愈尖锐的批评、指责乃至废除之声。对于高考这项牵涉面广、影响重大的大规模教育考试制度,应如何认识其存在价值?笔者认为,在高考恢复30周年的今天,既要深刻剖析其弊端与问题,也很有必要理性分析其社会功能与价值。本文拟从教育、文化、政治与社会结构等视角分析高考的社会功能。^[1]

一、教育功能

作为一种竞争激烈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高考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其一,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保障高校生源质量。考试是一种测量工具,就像体能测试或体育比赛可以测出一个人的体能和体质强弱一样,高考让所有应试者接受相同的挑战,将个人的才学和能力放在首位,因而历来被视为可以客观公正地选取优秀人才的公平尺度,或称“量才尺”。与推荐制下新生良莠不齐、文化程度较低的情况大不相同。高

考制度建立55年,特别是恢复高考30年来,为高校选拔了大量合格的人才。总体而言,高考成绩与考生实际水平是呈正相关的,高分者虽不一定个个高能,但低分者很少高能。高考分数具有很强的信度和效度,对保障生源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二,引导、规范中学的办学方向和教学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考是国家意志和政策与学校教育活动之间的一个中介,通过高考的科目设置和命题设计,国家可以将政治理论和思想意志贯彻到中学教育中去。比如在政治科考试中包括时事内容,便可以引导考生关心时事。也可以通过科目增减和考试内容的比重调整,来调控或促进某些学科的发展。因此高考对实施教育方针、引导办学方向具有重要作用。^[2]

其三,“魔力指挥棒”造成中学教育片面应试。高考与中学教学的关系理应是教什么就考什么,但强大的社会色彩使得高考对中学教学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成为一根“魔力指挥棒”,结果变成考什么就教什么。随着考试竞争的逐年加剧,高考也诱发了诸多问题:中学只抓智育片面追求升学率、文理偏科、学生负担过重且近视率攀升、影响求异思维和个性发展、学校办不出特色等等。这种片面应试的结果,造成智育一枝独秀,高考指挥棒功能遭致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高考也因此被批评为“黑色的七月”、“考试地狱”、“异化的高考”,甚至被人指责为“人神共愤的考试”^[3]。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考试公平与社会发展——以科举、高考为例”;课题编号: GFA060444。

收稿日期: 2007-02-18

作者简介: 郑若玲(1970-),女,江西修水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考试制度研究;厦门,361005。

客观地说, 高考对教育的这些负面导向功能, 从总体上确实不利于教育发展。但高考指挥棒作为一种客观存在, 对它一味的指责丝毫无益于改变现状, 如何发挥其正面指挥功能才是较为现实和客观的态度, 诚如潘懋元先生所指出, “高考‘指挥棒’是客观存在, 是反对不了的。……光埋怨不行, 谁也无法回避考试。应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考虑。何况指挥棒也有积极作用, 能引导学生认真学习。关键是如何朝正确的方向指挥。”^[4]何况, 高考对教育的导向功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长期以来, 人们诟病高考的主要方面之一是其激烈的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须知, 高考的竞争实质上是人们一生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等社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浓缩”。只要中国仍需以高考来制约高校招生所面临的关系、面子等人情困扰, 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便必然存在, 亦实属正常。^[5]

二、文化功能

考试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中检验、观察和试验等活动, 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文化的影响。但考试也同时反作用于文化, 具有相应的文化功能, 主要表现在选择文化和提升文化上。考试的文化功能既是考试自身系统的一种自然属性, 又与教育的文化功能密不可分。而且, 由于考试与教育的特殊关系, 使得前者在后者发挥文化功能方面常常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 前者文化功能之发挥又需要借助后者这个中介。高考作为一种影响力颇大的大规模教育考试制度, 具有明显的文化功能。

高考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体现了一种对公平理念文化的追求与选择。在中国选官制度史上, 为什么科举能力挫他法而雄踞千年之久? 因为此种倚重客观标准的考试制度, 可谓是对中国自古追求“至公”理念的一种文化选择。同样, 统一高考之建立, 除效益和质量的考虑外, 还有追求公平之本源因素。统一考试正是从制度上排除了考试之外人为因素的干扰, 有效地保证了考试的公平与健康发展, 使全体国民享有平等参与接受高等教育和追求社会地位竞争的机会。“文革”时期统一高考的废止, 使高校招生的公平性受到践踏, 公正有序的干部选拔工作亦被帮派林立、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混乱局面所取代, 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因此严重倒退了若干年。故而, 1977年恢复高考, 使整个社会“由乱而治”, 百姓欢声雷动奔走相告, 为中国

教育史乃至中国历史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一笔。高考的恢复, 正体现了舍出身、血统、关系等不公而取能力、学识、自身等公平因素的一种文化选择。

和考试制度相比, 考试内容的文化选择功能则表现得更为直接。考试内容所选择的的文化, 往往是强势文化, 或是先进文化。现代高考所考的中学九门基础课程, 是经过千百年锤炼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华, 也是经过精挑细选而来的先进文化。因此, 高考内容的选定, 也是对文化的一种选择。不过, 支撑考试内容的选择文化功能之发挥的, 仍是考试制度本身。制度越重要, 其考试内容的文化选择功能便越强大。

不仅如此, 高考提升文化的功能也十分明显。考试制度的好处甚多, 其中之一是求己不求人。人生求人之处居多, 而求人艰难, 且成功与否取决于他人。考试则提供一个反求诸己的机会, 成功与否主要靠自己的奋斗, 故考试选才能够促人向学、催人奋进。作为一种竞争性颇强的选拔考试, 高考具有强大的以考促学功能, 考生水平全面提高后, 为了保持一定的区分度, 不得不再逐步提高试题难度, 这种“水涨船高”的关系, 促使高考试卷难度和考生水平扶摇直上, 现在的高考试题难度和恢复高考之初相比已有天壤之别。高考始终是激励考生奋发学习、高中不断改进教学的最实际、最强大的动力, 并为提升社会文化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6]反而观之, 1958年, 受教育革命和“左”的思想影响, 调整了统一高考, 当年度免试录取了大批工农成分者, 致使新生质量和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次年不得不恢复统一高考。“文革”十年, 统一高考又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加以废除, 高等教育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中国的文化发展水平严重倒退了若干年。此亦可反证高考的提升文化之功。

三、政治功能

作为一种甄别个体差异性的社会活动, 考试受社会的政治制度所制约。考试制度的创建与实施, 无不体现着国家和政府的意志。国家通过为考试制定法律法规、考试标准甚至进行命题等来传播和执行自己的意志。而国家意志恰恰是政治的一种体现。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看, 考试制度亦隶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 其政治功能不言而喻。高考最主要的也是最现实的政治功能便是稳定社会秩序。

高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奉行的是公平公正原则。人们参加高考，不仅可以认同国家意志，而且通过公平的竞争获得一种满足感，因而对政府更多的是归顺而非忤逆。诚如台湾学者刘季洪所一语中的：“考试制度的运用，可以加强全国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无论他们属于哪一个种族，亦不论他们居住何方，皆可经由考试而加强他们与政府间的关系，使他们对国家更为忠诚。”而“循览前代史迹，则知人才恒倚考试而振兴，政治尤赖人才以推动，考试对政治之伟大功能，未因时代之递嬗而稍有贬损。”^[7]高考通过刚性的制度机制，为社会底层精英向上流动提供了保障，疏散了其对社会资源分配机制所郁积的不满，从而成为一种安全阀，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功用。尽管高考在 50 余年的历程中，不时受到人们的非议，最终仍无法被推荐制等其它办法所取代，不能不说有政治因素的考虑。再者，1966 年最高领导层选择废除高考作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并由此带来的混乱时局，以及 1977 年选择恢复高考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使整个社会由乱而治，也说明高考对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具有重大作用。

高考是维护社会公平、坚持社会公正、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归因于高考制度的长期实行，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无论贵贱贫富，“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或“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和社会文化氛围。高考对于平民百姓好在哪？一位陕北老农的话是最好的回答：“我的娃经过努力就能考上大学，县长的娃不努力就考不上大学！”^[8]千百年来，中国人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在考试方面则是不怨苦而怨不公。因为高考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考生即使名落孙山，也只能怨自己的水平或运气不佳。因而，高考能释放较低阶层的不满，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功用。反之，如果考生因为不公平的竞争而落榜，他们怨的则是政府和社会。在推荐制下，走后门盛行，无法上大学的学生眼见有权有势者的子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极易感到无助和愤懑，他们不满就可能聚集起来针对整个社会，形成对现存秩序的反抗力量，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此外，考上较低层次高校的考生今后也还有考上其他重点名牌大学的机会，高考实际上并非“一试定终身”。特别是在取消报考年龄限制后，高考理论上成为一种终身考试，为每一个落榜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希望。这就为落榜考

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使一些考生和家长的不满与失望不至层累到危险的程度。因此高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的“减压阀”与“稳定器”的作用。^[9]

四、更新社会结构功能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成员在具体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结构，它包括静态和动态两种状态。社会的静态结构通过社会分层来反映，动态结构则通过社会流动来反映。而社会的分层与流动都与政治稳定不无关联，许多政治分析家认为，一个工业社会的政治稳定或不稳定由其社会流动率所决定，高流动率的社会是稳定的，反之则是不稳定的。^{[10][6]}不仅如此，社会流动率与社会进步也呈正相关，社会流动越快、流动比率越高，则社会开放程度越高，社会也越进步。

根据功能主义理论，社会分层对于满足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的要求是必须的。只有让那些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和竞争力的人去承担那些最重要的工作或职位，社会系统才能保持平衡和协调，才能正常运转。高考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建国五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分层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20 世纪 50 年代至改革开放前，社会分层采取的是“身份制”制度，该制度将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等作为“社会屏蔽”的基本指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分。这些区分身份地位的指标由于多与“先赋因素”有关，缺少公平竞争的机会，束缚了社会成员的活力和积极性。改革开放后，身份制开始解体。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等取代传统的先天身份指标，所发挥的社会屏蔽和筛选功能越来越突出。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央在制订干部提升的标准上也强调学历的重要性，没有高等学历一般都得不到提升。^[11]这犹如给新的社会分层机制注入一剂强心针。而文凭、学历和技术证书等的获得，无一例外要通过考试尤其是高考的竞争或筛选这一渠道。随着社会结构开放性的加强，高考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高考又是通过促进社会流动来进行着社会分层的。据许欣欣对 1990 和 1993 年中国不同地位群体间的代际流动研究，得出国家干部这一我国社会分层体系中地位最高的阶层在接受新成员方面具有颇

高的开放度。^[10]^[242]而曾有相当长一段时期, 能够被列入干部编制的一条最主要途径, 便是取得国家正式的全日制中专以上学历后, 被国家人事部门按计划分配到具体工作单位。即使现在国家分配已由自主择业所取代, 取得高等教育学历文凭也仍是进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必备条件。在统一高考几乎是取得国家正式全日制中专以上学历机会唯一通行证的当代中国, 干部阶层有如此高的流入率, 以及由此所反映出的相应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率, 统一高考对于社会流动的作用就可见一斑了。

笔者曾对厦门大学 1997—2001 届博士毕业生的家庭出身做过统计, 得出有 56.7% 的博士来自除教师和干部外的非知识阶层家庭 (其中 37% 来自农民阶层)。^[12]尽管来自农民阶层学生的辈出率^[13]仍低于 1, 但低阶层子女通过层层竞争性考试 (高考是最关键的一环) 得以有机会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向流动并成为国家栋梁, 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高等学校尚未全面收费之前, 高考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尤其明显。在如今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 权力的侵扰虽然已不明显, 但金钱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对钱权皆无的广大草根家庭子女来说, 高考作为一个自致性因素, 几乎成为他们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实现阶层上向流动一条最公平合理的“独木桥”。而教育机会的公平竞争恰恰是社会和谐与进步发展的重要内容。^[14]

除了具有上述教育、文化、政治、更新社会结构等功能外, 高考还具有经济功能。随着高考“举国大考”地位的确立, “高考经济”也悄然兴起。“高考经济”既给出版印刷业、餐饮旅店业、交通运输业、网络业等带来巨大商机, 又强化着家教辅导、烧香拜佛、保健求医等商机。此外, 高考通过促使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来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 通过促进教育发展来反作用于经济, 通过对教育、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明显作用来促进社会 (包括经济) 的协调发展。^[15]

尽管现行高考制度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及现实的挑战, 也尽管在恢复高考 30 周年之际, 要求改革高考的呼声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旋律^[16], 但有一个事实无法否认: 高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成熟和最权威的人才选拔机制, 迄今尚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取而代之。^[17]高考的平民色彩、高考对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 以及民众对它的高度认可, 都是无论多么激烈的批判都无法否定的。对高考社会功能

之分析, 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 [1] 此社会是广义的社会概念, 指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 包括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等要素。后文的“社会结构”之“社会”, 取其狭义。
- [2] 刘海峰. 以考促学: 高等教育考试的功能与影响 [J]. 厦门大学学报, 2002 (2): 5 - 7.
- [3] 孙绍振. 废除全国统一高考体制 [J]. 艺术·生活, 1998 (6): 8 - 13.
- [4] 郑若玲. 坚持考试 改革考试——潘懋元教授访谈录 [J]. 湖北招生考试, 2002 (2): 38 - 43.
- [5] 郑若玲. 试析高考的指挥棒作用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02 (2): 7 - 10.
- [6] 刘海峰. 高考改革应稳步推进 [J]. 中国高等教育, 2007 (2): 9 - 11.
- [7] 廖平胜. 考试学原理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155.
- [8] 堵力. 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人解析高考新思路 [N]. 中国青年报, 2007 - 04 - 17 (6).
- [9] 刘海峰. 高考改革的教育与社会视角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2 (5): 33 - 38.
- [10] 许欣欣.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11] 李培林. 中国社会分层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7 - 19.
- [12] 郑若玲. 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侧重分析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之互动 [J]. 现代大学教育, 2003 (2): 21 - 25.
- [13] 辈出率是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如果辈出率为 1, 说明该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同一社会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相同; 如果辈出率超过 1, 则意味着该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 反之, 则低于平均水平。
- [14] 郑若玲. 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以厦门大学为个案 [J]. 教育研究, 2007 (3): 46 - 50.
- [15] 郑若玲. 考试经济与社会发展——以科举、高考为例 [J]. 湖北招生考试, 2006 (4): 4 - 7.
- [16] 宋晓梦. 理性对待高考改革 [N]. 光明日报, 2007 - 04 - 18 (10).
- [17] 刘武俊. 考试立法缺席 [N]. 中国青年报, 2000 - 07 - 14 (8).

(责任编辑 庞青山)